

【探讨与评论】

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困境

——评席尔瓦的《无可达标：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

王 欧

内容提要：在一定时期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稳定工作和经济独立、结婚成家并为人父母，是美国青年工人实现成年转型的传统模式。但过去数十年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使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陷入困境。基于美国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的长期调查，《无可达标：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一书发现，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通过制度化的风险转嫁和个体化的自我重建两个关键机制，彻底重塑了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模式。本文首先梳理出该书的一个分析框架，并据此呈现社会不平等如何通过教育、工作等制度化的风险转嫁机制，冲击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并瓦解其传统成年模式，让他们“无可达标”，并促使其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本文还提取出该书论证过程中的一条暗线，即通过对比青年工人和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的成年转型路径，突出社会不平等对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灾难性影响。本文认为，该书的主要研究发现破除了既有文献对成年转型的“中产式”理解，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为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尤其是注重中国家庭文化伦理和家庭组织结构的关键影响，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美国青年工人；成年转型；家庭结构；个体化；新生代农民工

一、引言：社会不平等与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困境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从70年代末的0.36上升为21世纪初的0.45，家庭财富的基尼系数则从1989年的0.79上升至2013年的0.85，其中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过去40年（1977-2007）的家庭收入仅增长7%，而财富最低的50%的家庭在过去24年（1989-2013）的家庭财富占有量从3.0%下降为1.1%（Goldin & Katz, 2008: 46; Pfeffer & Schoeni, 2016; Duncan & Murnane, 2011）。这一时期正是“跨世纪一代”（the Millennials）美国青年工人出生、成长和向成年转型（transition to adulthood）的年代。

已有研究敏锐地发现，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工人和贫民子弟与中上阶层子女在家庭资源、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也在日益增加（McLanahan & Percheski, 2008; Duncan & Murnane, 2011）；另一些研究注意到，青年工人无法像上一代工人那样进入工作稳定、收入较高、有工会和法律保障的劳动力市场之中，

作者简介：王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工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育与社会分层。

而必须接受缺乏前景的“非正规”工作 (precarious work) (Kalleberg, 2011; Western & Rosenfeld, 2011);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低下的经济能力和黯淡的职业前景使青年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无力维持家庭稳定, 甚至无法顺利结婚成家 (Smock et al., 2005; Cherlin, 2011)。这意味着, 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已经使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面临困境, 他们已无法像其父辈那样在一定时期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稳定工作和经济独立、结婚成家并承担为人父母之责, 其成年转型之路也可能与中上阶层青年大相径庭。

然而, 美国学界近年来虽已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跨世纪一代”青年的成年转型问题, 但由于缺乏社会分层的视野, 既有研究并未揭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独特影响。研究者虽已发现, 美国社会过去数十年的变化正在重塑青年的成年转型模式, 使原本标准化的成年转型事件序列被一再延后、打乱或反复 (Furstenberg et al., 2004; Berlin et al., 2010);^①但既有研究往往将该变化归因于社会发展 (如教育机会的扩展) 为年青一代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 成年转型被认为是“跨世纪一代”青年不断“探寻自我”的过程; 而大众媒体也一再渲染和强化这种观点 (Silva, 2013: 6-7)。显然, 既有研究并未深入考察社会不平等对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巨大限制, 尚未揭示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独特模式。

席尔瓦 (Silva, 2013) 的新著《无可达标: 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②基于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的长期田野调查, 细致考察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困境的深刻影响。该书发现, 社会不平等通过制度化的风险转嫁和个体化的自我重构两个关键机制, 彻底重塑了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模式, 推进了既有研究文献对成年转型的理解。

本文将首先梳理出该书的一个分析框架, 并据此呈现社会不平等如何通过日益市场化的教育制度和非正规化的工作制度向青年工人转嫁风险, 冲击其家庭结构并瓦解其传统成年转型模式, 迫使他们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接着将提取出该书论证过程中的一条暗线, 即通过对比青年工人与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的成年转型之路, 来突显社会不平等对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灾难性影响。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该书的研究发现放入相关的文献脉络中, 从分析思路的层面强调其两个重要贡献, 即通过引入社会分层视野推进了对成年转型的阶层差异的理解, 以及从“制度—个体”机制分析的角度促进了劳工研究与家庭研究的融合, 揭示出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独特模式。最后将讨论该书的研究发现和分析思路对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的借鉴意义。

二、重构青年工人的成年模式: 从“社会标签”到“自我成长”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 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且保持稳定 (Goldin & Katz, 2008: 46)。彼时的青年工人遵循严格标准化的成年转型模式: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能够完成高中学业, 随后顺利进入有工会保障的、收入较高的制造业工作, 并很快获得经济独立、搬离原生家庭以及迅速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③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序地经历如上环节并贴上教育、工作、家庭等“社会标签”, 标志着由社会认可

① 美国青年的成年转型时期已从20岁出头扩展至30多岁。

② 后文将简称该书为《无可达标》。

③ 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于二战后开始超过该年17岁人口的50%, 并于1975年增长至75% (Goldin & Katz, 2008: 195-196)。美国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60年代一直保持稳定, 男性和女性分别为22岁和20岁 (Silva, 2013: 6)。

的成年转型顺利完成,青年工人由此通向稳定的成年生活。

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使新一代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陷入困境。《无可达标》一书基于美国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的长期田野调查,细致考察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对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深刻影响。从2008至2011年,该书作者席尔瓦利用自身的工人阶级子女身份之便,跟踪访谈了麻省的洛厄尔(Lowell)和弗吉尼亚的里士满(Richmond)的100个工人子女,以生活史为线索收集他们的成年转型经验材料。^①该书发现,社会不平等主要通过制度化的风险转嫁和个体化的自我重构两个关键机制,冲击新一代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并彻底瓦解以“社会标签”为内容的传统成年转型模式,让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无可达标”,进而迫使他们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Silva, 2013: 8-24)。^②由于这一研究发现对“跨世纪一代”成年转型研究的突破性贡献,该书荣获201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分会的最佳著作奖(即William J. Goode Book Award)。

实际上,该书正是依据上述两个关键机制,分步骤论证社会不平等重构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的过程和后果。笔者用图1更明确地将其表述为全书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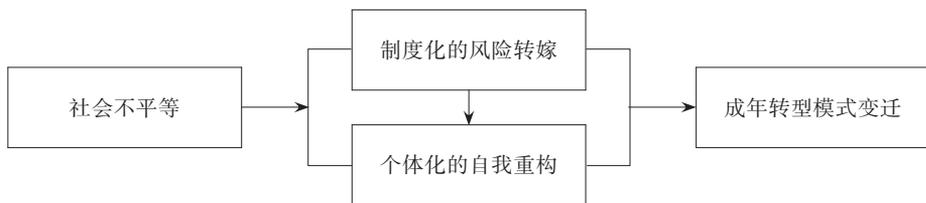


图1 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的变迁机制

所谓制度化的风险转嫁,是指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导致工人子女在成年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系列制度发生转型,从保障参与者的利益转变为让其承担风险。其中,教育制度的市场化使一部分工人子女虽然能获得“大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却无力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工作制度的弹性化使雇主可以灵活雇佣和解雇工人,由此压低工人工资并让后者承担失业风险;社会保障制度的私人化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将教育、医疗、失业等负担转嫁给工人个体(Silva, 2013: 13-15)。一系列制度化的风险转嫁的后果是冲击另一项完成成年转型的重要制度,即工人的家庭结构,使新一代青年工人无法进入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由此彻底瓦解以“社会标签”为内容的传统成年转型模式,并形塑了青年工人不断被制度抛弃和一再挫败的遍体鳞伤的日常生活经历(Silva, 2013: 8-9)。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风险转嫁制度——情绪经济(mood economy)——进一步将外在制度风险引入个体心灵深处,通过提供一系列制度化的情绪疏导渠道和管理方法(如心理治疗机构和情绪管理读物),青年工人转而在个体化的层面重建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新成年转型模式(Silva, 2013: 18-24)。

具体而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增加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其教育制度只能为少部分工人子女提供晋升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渠道,而“大众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转型则加剧了工人子女在其中的挫败经历。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虽已向工人和贫民子女“开放”,^③但其公共财政支持不断削

① 该书将工人子女定义为父亲只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的子女,年龄分布在24至34岁之间(Silva, 2013: 160-161)。

② 该书并未明确提出上述两个关键机制。笔者通过反复阅读,从全书的论证逻辑中将其提炼出来。

③ 二战以来美国的大学入学率快速增长,19岁人口的大学入学率从1940年的16%增加到2007年的66%(Bailey & Dynarski, 2011)。

减,学费持续攀升,教育质量却在下降(Armstrong & Hamilton, 2013; Arum & Roksa, 2011)。以工人和贫民子女大量聚集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盈利性学院(for-profit college)为例,前者吸纳了美国将近一半的大学生(约1千万),但只有16%的学生三年内可以获得某种大学学历,另有50%的学生终生无法获得任何大学学历(Goldrick-Rab, 2010);后者几乎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运作,学费高达社区学院的5倍以上,但其毕业生入学六年后的收入更低,失业率也更高(Deming et al., 2012)。^①实际上,在席尔瓦调查的100个工人子女中,有54人能够进入大学,其中多达27人无法获得任何大学学历,另有46人只能高中毕业或肄业(Silva, 2013: 160-161)。^②因此,在“大众高等教育”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多数工人子女必须依靠贷款和兼职才能勉强维持大学学业,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无法适应大学学习,在经历了多次挫败和背负了一身债务之后,彻底幻灭通过大学实现社会流动的美国梦,并被教育制度半途抛进劳动力市场之中(Silva, 2013: 47)。

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其中“非正规”工作的迅速扩张和工作制度的弹性化进一步恶化了低学历者(和部分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处境,使青年工人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和独立的经济能力,却必须承受失业、伤病等风险。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老一辈工人阶级从事的有工会保障且能够获得养家工资的制造业工作,多数已被一系列缺乏保障和收入低下的服务业工作替代;新一代青年工人被教育体制甩出后多数只能从事这类“非正规”工作,其典型特征是不稳定和缺乏发展前景、经济和社会保障低下、由雇主主导雇佣关系和控制劳动过程,并将失业、伤病等风险转嫁给工人个体(Wilson, 1996; Kalleberg, 2011; Cherlin, 2014)。在席尔瓦调查的100个工人子女中,只有8个仍然能够从事有工会保障且收入较高的传统工人阶级工作(主要为消防员、警察等公共部门工作),另有6人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了专业技术工作,其余全部从事“非正规”工作,包括服务员、售货员、收银员、保安、护工等(Silva, 2013: 163)。在成年转型阶段,青年工人通常的工作模式是在各种“非正规”工作之间频繁转换,在就业与失业之间不断徘徊,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险,大部分工人长期依赖多张信用卡维持生计,其中一部分无法搬离或一再回归原生家庭,一旦遇到疾病、家庭变故等意外便陷入绝境(Silva, 2013: 30-31, 36-41)。^③其结果是,工作制度的弹性化将雇主的市场风险转嫁给青年工人,“非正规”工作无法为其提供职业前景和经济独立,青年工人从中体验的是失败和背叛。

上述制度化的风险转嫁^④进一步冲击了新一代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使其难以进入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老一辈工人阶级凭借其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家庭工资,离开学校后很快建立起性别化的家庭结构(即 male-breadwinner family)(Cherlin, 2014),由此进入稳定的成年生活。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性别革命(gender revolution)已开始冲击传统家庭结构,并将个体(尤其是女性)从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促使新一代年轻人追求新的家庭结构来满足个体的欲望、利益和自我实现(Gerson, 2011; Lesthaeghe, 2014)。但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由此导致的前述制度化的风险转嫁,使新一代青年工人难以建构新的家庭结构以满足个体化的新需求:“非正规”工作摧毁了大部分青年男工的养家能力;许多女性

① 盈利性学院吸收的大学生从2000年的一百万攀升至2010年的四百万,2009-2010学年的学费高达13103美元。

② 还有24人最终获得学士学位(其中4人为硕士),3人拿到两年制肄业证书(associate degree)。

③ 在作者调查的100个工人子女中,多达35人仍与父母或其他扩展家庭成员同住(Silva, 2013: 160)。

④ 该书还提及社保制度和金融制度的风险转嫁(Silva, 2013: 36-41),但未充分展开论述,本文也对此从略。

宁可长期保持单身状态,也不愿进入无法满足其个体需求的亲密关系;那些能够进入亲密关系并努力维系家庭生活的青年工人,其家庭结构也被不稳定的经济收入、不规则的工作时间和难以预料与承受的意外风险围困(Silva, 2013: 31-33、56-58、62-75)。实际上,在席尔瓦跟踪的全部案例中,只有14人拥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即核心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其余多处于不稳定的亲密关系或单身状态。^①其结果是,作为完成成年转型的最重要的制度标签——家庭结构——被严重冲击,以“社会标签”为内容的传统成年转型模式也趋于解体,青年工人被迫转向个体层面建构新的成年转型模式。

在传统成年转型模式的废墟上,美国社会为青年工人设定了另一种制度化的风险转嫁机制,即通过以情绪管理和心理疏导为内容的情绪经济将外在制度风险引向个体心灵深处。面对青年工人在教育、工作、家庭等制度中随时可能出现和长期累积的挫败和创伤,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系列情绪管理和心理疏导渠道,包括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各类心理健康协会、专项心理治疗项目和大众情绪管理读物等(Silva, 2013: 141-142)。这些渠道以“治疗叙事”(therapeutic narrative)为手段,引导青年工人重新组织和解读成年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失败与创伤经历,帮助他们管理混乱情绪和克制不良嗜好(如酗酒、网瘾等),促使青年工人实现自我控制和心理成长(Silva, 2013: 116-124)。青年工人一旦接受并掌握了“治疗叙事”手段并据此主动应对成年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困境,以达到治疗创伤、管理情绪和自我成长的目标,便标志着成年转型的完成(Silva, 2013: 114-116)。这些已在个体层面实现成年转型的青年工人,不仅寻求并能够得到其他“成年”工人的认可,还进一步划定自我与其他仍深陷成年转型困境的青年工人之间的边界(Silva, 2013: 135-138)。

因此,社会不平等通过上述制度化的风险转嫁和个体化的自我重构两个关键机制,彻底重塑了美国新一代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模式,同时也将外在制度风险引向工人个体心灵深处,部分消解了青年工人与一系列成年转型制度之间的激烈矛盾。

三、社会不平等的力量:青年工人与中产阶级成年转型的比较

在论证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变迁的过程中,《无可达标》一书还潜藏着一条暗线,即通过对比青年工人与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的成年转型路径,以突显社会不平等对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灾难性影响。笔者将散落在全书各处的这条暗线梳理出来,并将其放入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进一步阐释社会不平等与成年转型模式之间的机制性关系。

实际上,在该书跟踪的工人子女案例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青年通过社会流动渠道成功跻身中产或准中产阶级行列,其中6人经由大学毕业获得专业技术工作,另外8人通过服役役得到公共服务部门工作(Silva, 2013: 161)。前者凭借收入和自主性较高的中产阶级工作,建构了稳定的、能够满足夫妻双方个体化需求的“协商性”家庭结构(negotiated family)(Silva, 2013: 72-73);后者依据有保障且能够赚取养家工资的公共部门工作,强化青年男工的男性气质,成功重构了性别化的核心家庭结构(Silva, 2013: 128-129)。这些中产或准中产阶级青年尽管也受性别革命和个体化需求的强烈影响,但他们在社会流动、工作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上的成功,保证了他们能够建构新的家庭结构来满足或抑制个体化对家庭稳定性的冲击,并避免外在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围困。他们在一系列制度上的成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成年

^① 其中5人已经离婚,14人未婚却已生育,56人保持单身,剩下的正在恋爱(Silva, 2013: 29、160-161)。

转型模式,却不必因持续的制度失败(尤其是家庭结构的解体),而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

潜藏在该书论证过程中的这条暗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不同阶层青年成年转型路径的深刻影响。实际上,随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支撑青年成年转型的教育、工作、家庭等制度安排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在“跨世纪一代”出生、成长和成年的过去数十年间,一方面,美国的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拉大,高等教育制度内部的不平等也趋于扩大,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聚集在质量较低的学校和市场回报较差的专业(Duncan & Murnane, 2011; Gerber & Cheung, 2008);^①另一方面,“好工作”与“坏工作”(即“非正规”工作)同步增长,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趋于明显,不同学历获得者的工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Kalleberg, 2011; Auto, 2014)。^②与之并行的是另一项影响成年转型的关键制度——家庭结构——的两极分化,其中不同阶层在婚姻、生育和代际关系模式等层面的断裂状况日趋明显,一部分中低收入者的家庭结构还有向传统底层黑人的残缺家庭趋同的趋势(Carlson & England, 2011; Massey & Sampson, 2009)。^③这些支撑成年转型的制度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不同阶层应对性别革命和个体化转型趋势的方式,其中中上层青年能够重建稳定的家庭结构以吸纳追求性别平等的个体化需求,而工人与贫民阶层青年则不得面对个体化需求与稳定的家庭结构之间的激烈冲突,被迫转向个体层面建构新的成年转型模式。

因此,《无可达标》一书中潜藏的上述暗线,反映了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不同阶层青年成年转型的深刻影响,也从中产阶级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不平等主要通过制度转型和个体重建两个关键机制形塑成年转型模式。

四、对既有研究的推进:社会分层视野和“制度—个体”分析机制

《无可达标》一书从多个方面推进了既有研究文献对成年转型的理解。笔者将从分析思路的层面指出该书的两个重要贡献。

首先,该书引入社会分层视野,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考察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的变迁,并(潜在的)与中产阶级进行比较,进一步破除了既有研究对成年转型的一元化、甚至“中产式”的理解。

本文在引言部分已经指出,美国学界过去十余年的研究已经发现,“跨世纪一代”青年的成年转型模式已发生转变,成年转型的时间范围被不断延后,需要经历的事件序列被一再推迟、打乱、反复或中断,使标准化的成年转型变得复杂和难以预测,也加重了父母一辈的负担(Furstenberg et al., 2004; Berlin et al., 2010)。但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源是社会发展(如教育机会的扩展)为青年一代提供了

①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美国收入最高的25%的家庭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从58%提高到80%,收入最低的25%的家庭的子女的对比例仅从19%提高到29%,两者之间的差距从39%扩大到51%(Bailey & Dynarski, 2011)。

② 从1977年到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增长了25%,高中毕业生仅增长1%,高中辍学者下降了13%(Duncan & Murnane, 2011)。

③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与比例、离婚率、生育状况和抚育模式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其中2010年学历最高的25%的女性与学历最低的25%的女性初次生育的年龄分别是30岁和20岁,成为单身母亲(single motherhood)的比例分别是10%和50%,生育后继续参与全职工作的比例分别是70%和31%(McLanahan & Jacobsen, 2015)。

更多选择机会,成年转型本质上是一段日益延长的青年“探索自我”之旅;而大众媒体也一再渲染和强化这种观点(Silva, 2013: 7-8)。过去几年以来,已有少量研究注意到成年转型模式的阶层分化,但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比较不同阶层青年经历各成年转型事件(如离开原生家庭的时间、建构新家庭的方式等)的差异,并特别强调不同阶层的父母对子女成年转型的干预和帮助的区别(Furstenberg, 2008; Lareau & Cox, 2011)。

在此基础上,《无可达标》一书引入社会分层视野聚焦“跨世纪一代”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并(潜在的)与中产阶级进行比较,突破了既有研究、尤其是大众媒体对成年转型的一元化和“中产式”理解,并揭示出青年工人独特的成年转型模式,向前推进了目前仅有的少数具有分层视野的成年转型研究的深度。这一重要的研究贡献可以启发后续研究者通过社会分层视野考察其他阶层(如贫民、中产阶级、精英)的独特的成年转型之路,并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突出社会不平等对成年转型的巨大影响。^①

其次,该书在引入社会分层视野具体考察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变迁的过程中,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制度一个体”分析机制,汇入了晚近以来劳工研究和家庭研究两个文献脉络日趋融合的学术发展趋势,为其他社会条件下的成年转型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工具。

随着美国的经济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工人处境的恶化,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劳工议题(如劳动过程的控制、雇佣关系的非正规化、工会和集体抗争的衰退等),并将研究视野向与之相关的工人社区、家庭结构等“非工作领域”扩展。已有研究注意到,工人在工作领域的不利处境已导致社区关系的弱化、家庭内部的冲突,甚至已重塑工人的婚姻和生育模式,并冲击工人个体的心理健康(Kalleberg, 2009; Milkman, 2009; Cherlin, 2011)。与此同时,随着性别革命和个体化转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后继续从事全职工作,一批家庭研究者开始将对家庭的关注向“非家庭领域”扩展,从“工作—家庭”冲突的角度考察家庭与性别关系的变迁,尤其注重对工作与家庭结构限制女性的个体化需求的批判(Hochschild, 1989; Jacobs & Gerson, 2004; Bianchi & Milkie, 2010)。

《无可达标》一书汇入了以上两个文献脉络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将劳工研究的“非工作领域”和家庭研究的“非家庭领域”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上文已详细论述的“制度一个体”(即制度转型和个体重构)分析机制,成功打通青年工人成年转型必经的一系列外在制度、家庭结构和工人个体之间的联系,为考察其他社会条件下的成年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力的分析工具。^②

五、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启示:问题意识、路径差异和家庭影响

该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和在分析思路层面上的上述贡献,为研究者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笔者将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的问题意识、可能存在的路径差异,以及通过跨国比较突显出来的中国家庭文化与家庭结构的重要影响,来具体展开说明。

^① 实际上,在《无可达标》一书出版之后,席尔瓦正沿着该分析思路继续前进,深入考察了中产阶级子女在建构亲密关系和入读大学等成年转型关键环节的独特经历,并与工人阶级子女进行比较,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分层视野下的成年转型研究(Corse & Silva, 2017; Silva & Snellman, 2018)。

^② 近几年来,以上两个领域的文献脉络更有走向融合的趋势,研究者越来越自觉地将“非工作领域”与“非家庭领域”结合起来,从外在制度(如工作、社保体制)、家庭结构与个体化需求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不同阶层的相关研究议题(Kalleberg, 2018; Milkman, 2016; Cherlin, 2014; Blair-Loy, et al., 2015)。

首先,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引起关注。与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依靠乡土社会的制度结构、按标准化的方式快速完成成年转型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期间所面对的制度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已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并在就学期间形成了城市取向的价值观、消费方式和人际网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另外一些研究表明,这代年轻人多数直接从学校进入高度“非正规化”的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普遍缺乏务农经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流动极为频繁(符平、唐有财,2009;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还有一些研究指出,打工社区的居住和消费空间为他们经历浪漫爱情提供了制度条件,婚前同居、未婚先孕和一系列旨在满足个体欲望的个体化需求也不断涌现(宋月萍等,2012;阎云翔,2016);而这代青年一旦结婚成家,其家庭结构也面临被城乡二元结构围困的风险,甚至导致夫妻分居、亲子离散等家庭关系扭曲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金一虹,2009;汪建华,2016)。显然,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工作、社区等外在制度和由此形成的对家庭结构和工人个体化需求的影响,已经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模式与他们的父辈迥异。但目前的研究仅仅各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侧面,使系统考察该群体的成年转型模式成为一个迫切的研究问题。

其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结构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下的处境不同,其成年转型模式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有少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无法走完成年转型(如富士康自杀的未婚青年工人)(郭于华等,2011);还有一部分青年男工不得不一再推后结婚成家的年龄,甚至面临终生无法结婚成家的命运(Ebenstein and Sharygin, 2009; Jiang et al., 2014; Raymo, et al., 2015);^①另外一些青年工人虽然可以顺利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但必须忍受夫妻分居、亲子分离的“拆分型”家庭结构(谭深,2011;李代、张春泥,2016);当然,也有一部分可以成为打工城市的“常住人口”,并在打工地维持完整的家庭生活(汪建华,2017;王欧、王天夫,2019)。这意味着,与美国工人阶级子女成年转型的阶层分化类似,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结构下的处境也出现了分化,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路径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亟需研究者对此做出解释。

再次,在具体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时,通过跨国比较,可以看到中美两国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的根本差异,并突显家庭化(即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和中国家庭文化伦理与家庭组织结构对维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结构的重要影响。

美国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家庭结构的极度不稳定。^②在“非正规”工作和性别革命(尤其是女性的个体化需求)的冲击下,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解体的边缘。其中,很大一部分青年男工完全不具备结婚成家的经济条件;一部分女工则不愿意进入没有前途的亲密关系,也无法接受抑制其个体化需求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外在制度风险的围困很容易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造成数量庞大的单身母亲家庭(Smock et al., 2005; Silva, 2013: 62-71; Carlson & England, 2011)。正是在家庭

① 已有研究表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1983年至2011年期间出生的婚龄期剩余男性每年将以131万的速度增长;在预计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未来20年(即2011至2030年)将逐渐恢复正常水平的情况下,22岁以上的剩余男性的总量将在2028年达到3000万,并在2043年达到4100万的峰值水平(Huang, 2014)。

② 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新一代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0年,美国服务业白人男工(20岁至49岁)的结婚比例从高于60%下降到低于30%,而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业的白人男性的结婚比例则一直高于60%;在同一时期内,受教育最低的25%的女性中单身母亲的比例从30%上升至50%,而受教育最高的25%的女性中单身母亲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0%以下(Cherlin, 2014: 17; McLanahan & Jacobsen, 2015)。

结构趋于瓦解的背景下,美国青年工人才将外在制度风险引入个体心灵深处,被迫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通过个体情绪管理消化外在制度矛盾。

与之相对,在严酷的城乡结构处境下,除了前述因性别比失衡而推迟婚龄或难以结婚成家的新生代男工之外,其余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女工)仍然能够结婚成家并设法维系家庭结构稳定。^①尽管一些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城市化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化需求倾向(如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婚前同居的流行等),甚至试图通过对家庭关系的运作来满足个体的欲望、利益和需求(汪建华,2015;Choi & Peng,2016:48-61;阎云翔,2016:9-10);但另一些研究通过跟踪和回访,发现结婚成家(尤其是生育)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很快变得与老一辈父母一致,从“为自己而活”转变为“为子女而活”;夫妻之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也被再生产出来,一些新生代女工为了子女养育而中断工作或不断在城乡之间往返;老一辈父母更是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压缩养老需求为代价,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结婚成家和维系家庭结构的基本功能(阎云翔、郑诗亮,2015;Chuang,2016;王欧、王天夫,2019)。

由此可见,家庭化作为成年转型的必经环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标志着成年转型的完成,还抑制了个体化需求对家庭结构稳定性的冲击,避免了新生代农民工滑入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同时也吸纳了城乡结构等外在制度转嫁给他们的的一系列矛盾。在此过程中,源自中国社会独特的家庭文化伦理和家庭组织结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恰与美国青年工人追求性别平等与个体化的家庭生活理想、逐渐从婚姻制度中“退出”并最终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值得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的研究者特别给予重视。

在以上三个方面之外,《无可达标》一书展示的“制度一个体”机制分析思路,也为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以此为参照,研究者应更加注重劳工研究与家庭研究的交汇与融合,注重教育、工作、社区和其他城乡制度、尤其是中国家庭文化伦理和家庭组织结构对维系家庭稳定的影响,以及家庭结构与青年工人个体化需求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展示不同城乡处境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路径。

六、结论：“被隐蔽的创伤”

基于对《无可达标》一书的阅读和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首先提炼出该书的一个分析框架,并据此呈现全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即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通过制度化的风险转嫁和个体化的自我重构两个关键机制,彻底重塑了“跨世纪一代”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模式。本文还提取出该书的一条暗线,通过对比青年工人和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的成年转型模式,来进一步论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影响机制和灾难性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分析思路的层面指出该书的两个重要研究贡献,即通过引入社会分层视野突破了既有研究对“跨世纪一代”青年成年转型的“中产式”理解,以及通过“制度一个体”分析

^① 目前,已有一些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比美国新一代青年工人具有更高的结婚比例和更稳定的家庭结构。例如,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16至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超过55%已经结婚,其中85.1%需要抚育至少一个15周岁及以下的子女(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1:130-131);南京大学对全国13个城市的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表明,2014年24至34岁的青年农民工已婚的比例高达74.85%,离异的比例仅为0.97%(匿名评审人提醒笔者注意该项数据,笔者深表感谢)。

机制向前推动了劳工研究和家庭研究两个文献脉络的交汇和融合,为其他社会条件下的成年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该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和在分析思路层面上的研究贡献,为研究者形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的问题意识、注重不同城乡处境下的成年转型路径差异以及重视家庭化和中国家庭文化伦理与家庭组织结构的独特影响,提供了跨国比较素材和分析参照对象。

当然,作为一本脱胎于作者博士论文的“少作”,《无可达标》一书也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其中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引起后续研究者的重视:第一,该书对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和一系列制度化风险转嫁机制出现的结构根源缺乏探讨和必要的交代,而这恰是启动青年工人成年转型模式变迁的根源。该书尽管在导论部分提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制造业的衰退和性别权力关系的变化等社会转型趋势(Silva, 2013: 13-16),却未涉及全球化与制造业产业转移、信息与自动化技术对低端制造业工作的替代和由性别革命引起的生活方式转型等经济社会变迁对社会不平等和制度化风险转嫁机制的影响(Kalleberg, 2011; Auto et al., 2003; Cherlin, 2004, 2014)。^①第二,该书虽然暗含了一条对比青年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同的成年转型路径的线索,但所用的经验材料全部来自于工人阶级子女,实际对比的是那些成功跻身于中产阶级的工人子女与无法实现向上流动的工人子女的成年转型路径。进一步的研究应该通过工人阶级子女和中产阶级子女各自的经验材料,来进行更精确、更有说服力的阶层比较。^②第三,该书过于强调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在消化工人个体与外在制度之间的矛盾的效率,却未涉及其他调试与应对方式。实际上,已有一些研究显示,强化扩展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是一部分青年工人(尤其是单身母亲)实现成年转型和应对外在困境的一种主要方式(Swartz, 2009; Gerstel, 2011);另一些青年工人则通过集体行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黑人生命珍贵运动)或参与政党政治(如投票支持保守主义政党人物)公开表达诉求(Milkman, 2018; Lamont et al., 2017)。^③这些个体化调试之外的其他应对方式,也应该成为考察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不可忽略的面相,并具有更大的公共政策意涵和社会进步潜力。^④

尽管存在上述不尽完善之处,作为出生于工人之家、在工人社区长大、并有幸通过美国的教育制度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的《无可达标》一书的作者,席尔瓦见证了身边绝大多数同龄人的痛苦的成年转型之路,同时又能以一个中产阶级青年的眼光与之进行比较。在将个人经历发展成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问题时,作者保留了对“跨世纪一代”青年工人的切身观察和同情之心。作者在书中详述了一位名为德洛丽丝(即 Delores, 34岁)的单身女工的例子:这位女工在成年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挫败之后,最终走向了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她彻底接受了“治疗话语”,习惯于将自己在“非正规”工作和不稳定家庭关系中的一再挫败和与之伴随的情绪混乱、抑郁和头痛等病症,解释为需要治疗的创伤、应该控制的情绪和一次即将到来的自我成长;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这套“治疗话语”遮蔽了女工脑中的恶性肿瘤,挡住了她通过正当的就医途径发现真实疾病的可能性,最终夺去了女工的生命(Silva, 2013:

① 该书的这一不足,也让笔者在写作本文时耗去不少时间梳理美国“大众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工作的“非正规化”和家庭理想的个体化等趋势和形成机制,以便能更准确地把握该书的核心论点。

②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醒笔者指出该书的这一不足。

③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投票中,高达71%的未受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和61%的未受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绝大多数为工人群体)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对应投票比例分别为53%和44%(Milkman, 2018)。

④ 实际上,席尔瓦本人也认识到该书的这一不足。笔者在她个人的网页上看到,一本专门探讨新一代青年工人的苦痛和政治参与的著作将很快出版。新著的书名为 *We're Still Here: Pai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fe*。

139-140)。作者用这个极端的例子表明,社会不平等如何将外在制度风险植入个体心灵深处,给“跨世纪一代”青年工人造成极其残酷的“被遮蔽的创伤”;这个不幸女工的例子也进一步表明,唯有转变青年工人成年转型必经的制度化的风险转嫁逻辑,才能让新一代青年工人走出成年转型困境(Silva, 2013: 152-157)。这个例子作为全书分析逻辑和主要发现的隐喻,也启发研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的学者关注不平等的城乡结构如何通过制度化的风险转嫁机制,给农民工家庭和个人造成巨大的“被隐蔽的创伤”,并据此探索可能的改善之道。

参考文献:

- 符平、唐有财, 2009,《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12期。
- 郭于华、沈原、潘毅、卢晖临, 2011,《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二十一世纪》总第124期。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1,《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金一虹, 2009,《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李代、张春泥, 2016,《外出还是留守?——农村夫妻外出安排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2013a,《行动与困境——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13b,《“短工化”: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宋月萍、张龙龙、段成荣, 2012,《传统、冲击与嬗变——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探析》,《人口与经济》第6期。
- 谭深, 2011,《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汪建华, 2015,《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16,《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图景》,《文化纵横》第3期。
- , 2017,《城市规模、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青年研究》第3期。
- 王欧、王天夫, 2019,《城市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结构》,待刊稿。
- 阎云翔, 2016,《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阎云翔、郑诗亮, 2015,《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道德转型》,吴小英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rmstrong, Elizabeth & Laura Hamilton. 2013. *Paying for the Party: How College Maintains Inequ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rum, Richard & Josipa Roksa. 2011.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utor, David. 2014. “Skills,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the ‘Other 99 Percent’.” *Science* 344: 843-851.
- Autor, David, Frank Levy and Richard Murnane.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1279-1333.
- Bailey, Martha & Susan Dynarski. 2011. “Inequality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Greg Duncan and Richard Murnane(eds.). *Whither Opportunity? Rising Inequality, Schools, and Children’s Life Chanc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erlin, Gordon, Frank Furstenberg & Mary Waters. 2010. “Introducing the Issu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0(1): 3-18.
- Bianchi, Suzanne & Melissa Milkie. 2010. “Work and Family Researc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705-725.
- Blair-Loy, Mary, Arlie Hochschild, Allison Pugh, Joan Williams & Heidi Hartmann. 2015. “St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Gender, Work, and Family: Insights from the Second Shift for the Next Quarter Century.”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18(4): 435-454.
- Carlson, Marcia & Paula England. 2011. “Social Class and Family Patter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cia Carlson and Paula England(eds.). *Social Class and Changing Families in an Unequal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rlin, Andrew.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4): 848-861.
- . 2011. “Between Poor and Prosperous: Do the Family Patterns of Moderately Educated Americans Deserve a Closer Look?” in Marcia Carlson and Paula England(eds.). *Social Class and Changing Families in an Unequal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14. *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hoi, Susanne & Peng Yinni. 2016. *Masculine Compromise: Migration, Family, and Gender in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uang, Julia 2016. "Factory Girls after the Factory: Female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Gender & Society* 30(3): 467-489.
- Corse, Sarah & Jennifer Silva, 2017. "Intimate Inequalities: Love and Wor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llison Pugh(ed.). *Beyond the Cubicle: Job Insecurity, Intimacy and the Flexible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ming, David, Claudia Goldin & Lawrence Katz. 2012. "The For-Profit Postsecondary School Sector: Nimble Critters or Agi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1): 139-164.
- Duncan, Greg & Richard Murnane. 2011. "Introduction: The American Dream, Then and Now." in Greg Duncan and Richard Murnane(eds.). *Whither Opportunity? Rising Inequality, Schools, and Children's Life Chanc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Ebenstein, Avraham & Ethan Sharygin 2009. "The Consequences of 'Missing Girls'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3(3): 399-425.
- Furstenberg, Frank. 2008.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19: 1-10.
- Furstenberg, Frank, Sheela Kennedy, Vonnice Mcloyd, Ruben Rumbaut & Richard Settersten. 2004. "Growing Up is Harder to Do." *Context* 3(3): 33-41.
- Gerber, Theodore and Sin Yin Cheung. 2008.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m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299-318.
- Gerson, Kathleen. 2011.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ming of Age in a New Era of Gender,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stel, Naomi. 2011. "Rethinking Families and Community: The Color, Class, and Centrality of Extended Kin Ties." *Sociological Forum* 26(1): 1-20.
- Goldin, Claudia & Lawrence Katz. 2008.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rick-Rab, Sara. 2010.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 Success." *Review of Education Research* 80(3): 437-469.
-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 Huang, Kuangshi. 2014.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12): 1642-1661.
- Jacobs, Jerry and Kathleen Gerson. 2004. *The Time Divide: Work, Family, and Gender Inequ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Quanbao, Marcus Feldman and Shuzhuo Li. 2014. "Marriage Squeeze, Never-Married Proportion, and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3: 189-204.
- Kalleberg, Arne. 2009.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1-22.
- . 2011.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 2018. *Precarious Lives: Job Insecurity and Well-Being in Rich Democrac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mont, Michele, Bo Yun Park and Elena Ayala-Hurtado. 2017. "Trump's Electoral Speeches and His Appeal to the American White Working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8(S1): S153-S180.
- Lareau, Annette & Amanda Cox. 2011. "Social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Differences in Parents' Interactions with Institution." in Marcia Carlson and Paula England(eds.). *Social Class and Changing Families in an Unequal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sthaeghe, Ron. 2014.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51): 18112-18115.
- Massey, Douglas & Robert Sampson. 2009. "Moynihan Redux: Legacies and Lesson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1: 6-27.
- McLanahan, Sara & Christine Percheski. 2008.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257-276.
- McLanahan, Sara & Wade Jacobsen. 2015. "Diverging Destinies Revisited." In Paul Amato, Alan Booth, Susan McHale, and Jennifer Van Hook (eds.). *Families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Diverging Destinies*. New York: Springer.
- Milkman, Ruth. 2009. "Class Disparities, Market Fundamentalism and Work-Family Policy: Lessons from California." in Erik Olin Wright, Janet Gornick and Marcia Meyers(eds.). *Gender Equality: Transforming Family Divisions of Labor*. New York: Verso.

- . 2016. *On Gender, Labor, and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 2018.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U.S. Labor: An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 *Novos Estudos* 37(1): 99–115.
- Pfeffer, Fabian & Robert Schoeni. 2016. “How Wealth Inequality Shapes Our Future.”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6): 2–22.
- Raymo, James, Hyunjoon Park, Yu Xie & Wei-jun Jean Yeung.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 Silva, Jennifer. 2013. *Coming Up Short: Working-Class Adulthood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lva, Jennifer & Kaisa Snellman. 2018. “Salvation or Safety Net? Meanings of ‘College’ among Working- and Middle-Class Young Adults in Narratives of the Future.” *Social Forces* 97(2): 559–582.
- Smock, Pamela, Wendy Manning & Meredith Porter. 2005. “Everything’s There except Money: How Money Shapes Decisions to Marry among Cohabitato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3): 680–696.
- Swartz, Teresa. 2009.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in Adulthoo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191–212.
- Western, Bruce & Jake Rosenfeld. 2011. “Unions, Norms, 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4): 513–537.
- Wilson, William.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Working-Class Youth’s Dilemma of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 Review on *Coming Up Short: Working-Class Adulthood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WANG Ou

Abstract: American working-class youth transits to adulthood in traditional way by completing school, finding a stable job, making one’s economy independent,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children timely and smoothly.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s made it in trouble. Based on a survey of two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ities, *Coming Up Short: Working-Class Adulthood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finds that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has completely reshaped the model of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through two mechanisms, namely institutionalized risk transfer and individualized self-reconstruction. This review first sorts ou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book, and shows how social inequality impacts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young workers and disintegrates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coming age through the two mechanisms mentioned above, prompting them to turn to the new individualized “treating trauma and self-growth” model. The review also extracts a hidden clue of the book, which highlights the disastrous effects of social inequality on young workers by comparing the very different coming age paths of working-class youth and their middle class counterpar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book have broken the “middle-class”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used in the book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xamin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American Working-Class Youth;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Family Structure; Individualization; New Generational Migrant Worker

(责任编辑: 闻翔)